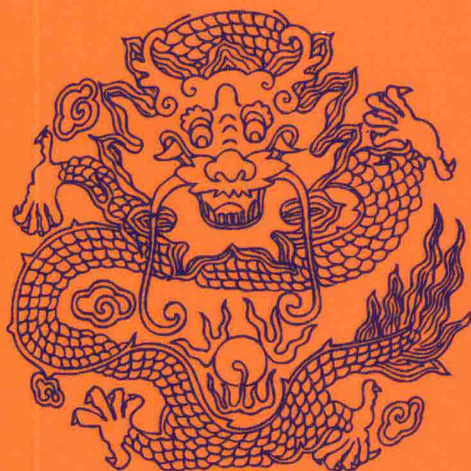


清代财政史四种

清代关税:1644—1911年



倪玉平/著



科学出版社

清代财政史四种

清代关税：1644—1911 年

倪玉平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关税涵盖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是清廷重要的财政收入。本书依托大量的档案、官书等相关史料,对有清一代的关税征收问题,做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和研究。太平天国运动之前,关税征收量的变化较为平稳。此后,因西方势力的介入,洋关迅速崛起,并带动整体关税飞速增长,虽经利用人口和物价指数对关税量进行修正,但并未完全改变这一增长趋势。清代关税结构与总量的变化,成为中国传统财政体制由农业型财政向工商业型财政转变的关键因素。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的轨迹,并没有偏离世界主流道路,不能被看成是一个“例外”。

本书适合历史学和经济学领域的相关研究人员,对清代历史感兴趣的人士也可阅读使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代关税:1644—1911年/倪玉平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9

(清代财政史四种)

ISBN 978-7-03-054633-3

I. ①清… II. ①倪… III. ①关税-经济史-中国-1644—1911 IV. ①F752.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36221号

责任编辑:李春伶 刘蒙伟/责任校对:韩 杨

责任印制:张 伟/封面设计:黄华斌

编辑部电话:010-64005207

E-mail: lichunling@mail.sciencep.com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7年9月第 一 版 开本:720×1000 B5

2017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8 1/4

字数:280 000

定价:6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序 一



李伯重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清代关税：1644—1911 年》认为，如果一位学者对历史缺乏了解，那么他将不可能在实质上对清朝的关税及清代中国政治经济的一般性有透彻的认识。

财政在世界历史中的重要性无须刻意正名。现代财政孕育了现代经济史及现代国家，同时还能使我们从现代社会中追溯那些传统社会财政革命中的伟大进步。

这本书描述并分析了清代财政的发展，特别是现代公共收入的一个主要部分——关税。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土地税和人头税占据财政收入的大宗，而关税只占据很小的比例。在西欧早期近代化时期，关税增长非常迅速，最终取代了土地税和人头税，成为财政收入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类似的变化同样在 19 世纪中叶的中国产生，这一变化也是自 19 世纪中叶开启的中国近代化变迁的一部分。

在清朝，关税涵盖了国内贸易及国际贸易的所有商品，并由两个机构分别征收。这两个机构分别为：常关，即针对国内贸易商品征税的一般性关口；洋关，即针对国际贸易征税的关口。在该书中，由这两个机构征收的税都被称作“关税”。这是因为尽管我们对常关和洋关的职能做了清晰的界定，但在某些情况下两者的职能是相重叠的。此外，在 19 世纪晚期，国内关税主要由厘金（likin）构成，虽然此时掌管进出口税务的现代海关服务

已经从西方引进，很多情况下厘金仍由地方政府征收。为避免读者对清代中国税收的不同含义而引起的误解，在此我们采用它们原始的名字——关税（guanshui），而非英文翻译过来的关税（custom duties）。

关税问题在清朝国家财政中占据特殊的地位。19 世纪中叶以前，关税已经在清朝财政收入中占据了相当可观的份额^①，尽管占据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三的土地税仍是财政收入的基石。然而，19 世纪下半叶关税陡然上升，在清朝的最后十年一跃成为第一大财政收入来源。^②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没有关税，那么清朝将无法管理国家，甚至无法生存下去。因此，关税对理解清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

清朝见证了关税重要性的变迁。在清朝统治的前两百年中（1644—1850 年），国家遵循了传统财政的基本原则——“量入为出”，并且长期基本没有变动。清代中后期，传统财政体系甚至连同整个国家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国家财政发生了剧烈的变革，关税迅速增长，这一变化的结果是关税连同土地税及盐税共同组成了清朝的三大财政支柱。^③

这一变化发生在世界历史的大转折时代，最近被称之为“大分流”。安格斯·麦迪森同样认为，19 世纪中叶是中国经济从长久繁荣走向长期衰落的转折点。^④恰好在此时期，中国开始了走向现代化的崎岖坎坷之路，财政

① 根据中学锋的研究，18 世纪下半叶和 19 世纪前期清代财政收入中，关税占据 11%—12% 的份额，参见中学锋：《清代财政输入规模与结构变化述论》，《北京社会科学》2002 年第 1 期，第 84—90 页。

② 中学锋认为，1911 年关税和厘金共占据财政收入的 47%。这一比例远远大于其他主要收入来源土地税（27%）和盐税（26%），《清代财政输入规模与结构变化述论》，《北京社会科学》2002 年第 1 期。王国斌（R. Bin Wong）认为，1849 年财政收入为 4250 万两白银，77% 来自农业，其他来自商业。1885 年，财政收入大约增加至 7700 万两白银，主要来自商业税的增长。在这一时期，商业税增加了 3 倍。1911 年，清朝最后一个财政年份，收入达到 3.01 亿两白银，农业税从 1885 年的 3000 万两增加至 1911 年的 5000 万两，而杂税有 4500 万两，商业税则占 2.07 亿两以上，参见 R. Bin Wong, *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Chapter 1.（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纽约：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98 年。）

③ 其中，鸦片税占据全部财政收入的 10%，参见周育民：《19 世纪 60—90 年代清朝财政结构的变化》，《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0 年第 4 期，第 52—60 页。

④ 安格斯·麦迪森：《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Second edition）. Paris: Development Centre of 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07, Chapter 1.（《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第二版，巴黎：经济合作与发展中心，2007 年。）

改革在转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由于在清代财政中的特殊地位，关税的变迁被认为是清政府挽救政权及实现现代化的标志。

对清代关税的研究可追溯至一个世纪以前。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前辈学者在研究上已经付出了相当多的努力。特别是最近十年，学者们正在尝试与历史时期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英文缩写 GDP）研究相结合的新路径。尽管先行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重大突破，但不可否认仍存在一些缺陷，数据材料和方法论两个方面也存在一些研究空白。因此，到现在为止我们尚未对关税及关税在清朝政治、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有一个精确、完整的认识。该书主要力图填补这些空缺，特别是旨在为关税研究建立一个可靠实用的数据资料库，并进而解释其背景和意义。

该书作者曾花费了数年时间搜集 19 世纪前半期的关税数据并进行充分分析，其成果《清朝嘉道关税研究》已经在 2010 年出版。^①这本书曾是清代关税研究的一项有益探索。作者完全依据第一手档案史料，为其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清朝嘉道关税研究》出版之后，作者花费了更多的精力进行数据搜集工作，并进而改善了研究方法。作者研究的新成果——《清代关税：1644—1911 年》的出版证明多年艰辛的劳动是富有成效的。

这本新书有一些关税领域的重要发现，对我们理解清朝的政治、经济具有非常大的帮助。

第一，该书揭示了关税变迁的趋势。在清初及清中期，常关税（由常关征收的税）保持稳定，但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下降幅度达到一半。相反，洋关税（由洋关征收的税）大幅增加。两个税种相加，关税总额由清前期的每年约 500 万两白银增加至清末的每年约 3500 万两白银，增幅 6 倍。其间，由长江和大运河征收的常关税仍占据所有常关中的大宗，而港口的洋关税则保持了更迅速的增长。这一趋势反映出中国贸易由内陆到沿海的关键性转变。

^① 倪玉平：《清朝嘉道关税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年。

第二，通过人口和物价数据，作者对清关税总量做了重要的修正和增补。政治制度和财政发展之间紧密的联系决定了清代财政史的分期。该书以 1850 年为分界线，明确将其划分为两个时段：1644—1850 年和 1850—1911 年。作者发现人均关税额在 1850 年之前保持稳定，但在 1850 年之后迅速蹿升，增长 6—7 倍之多。此外，通过物价指数的修正，相比于 18 世纪下半期，19 世纪上半期的人均关税额实际有所下降，由此，所谓“道光萧条论”可能是正确的。1850 年以后，关税额大幅增长，但实际上仅增长 3—4 倍，而不是名义上的 6 倍。

第三，通过利用关税，作者对一些特殊年份，如 1724 年、1766 年、1812 年、1840 年、1850 年、1887 年和 1910 年的商业出口量进行了估算，既包括总额，又包括人均数额，进而得出结论：商业出口在 1766 年达到了峰值，随后在 19 世纪上半期平稳缓慢下滑。此后，它急速增加，并在 1887 年达到新的巅峰。1910 年，有所回落，但仍是 1850 年之前的两倍。这项尝试为研究中国历史时期 GDP 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第四，作者认为，关税的发展促使中国从以农业为基础的传统财政向以商业为基础的新型财政变迁，同时也可以看出 17—19 世纪财政制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轨迹。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并不是通常被认为的“例外”。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轨迹从来没有偏离世界主流道路。

第五，传统观点认为，中国长期与外界“隔绝”，特别是与现代西方“隔绝”，直到 1840 年鸦片战争英国击败中国后，才被迫对外开放。但是，这一长久以来的传统认知近年来受到了强烈挑战，一种新的观点正在形成。这一新观点，史景迁表述得非常清楚：“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命运，已经至少在 17 世纪开始就与稀缺资源的搜集、货物的交换以及知识点扩张密不可分。”^①受全球史启发，作者特别强调了洋关税的变迁及其对清朝政

① Jonathan D. Spence: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New York: Norton, 2012, Preface. (史景迁:《追寻现代中国》，纽约：诺顿，2012 年，前言。)

治、经济的影响。将中国置于全球化语境中审视，是作者在这本书中进行的切实的努力。

总而言之，该书代表了中国财政史领域一项新的成就。清代中国，尤其是晚清，是一个丰富的体系，宛如一项精密复杂的实验，如外债和现代关税，挑战着我们对于典型的前现代财政发展的认识。透过宏大的时间和空间背景，该书揭示了在背后推动和强化中国经济集约化、创新及整顿的模式及相关因素。了解以上这些，一方面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经济的模式及革新；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在长时段中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这是作者的目的。

序 二

Maarten Duijvendak

(荷兰格罗宁根大学近现代史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
社会经济史教授)

这本书展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语言对于历史学研究的重要性。由于缺乏掌握中英双语的国际学者与广泛研究档案材料的机会，大量有趣的中国历史仍然不为外界所知。其次，该书的研究基于作者十多年间在不同档案馆中的大量工作，而这正是其所展现的，即第一手文献在历史研究中的价值。对档案材料中的原始记录进行细致的搜集、整理，将定量的数据与定性的思考相结合，构成了该书的研究——通过财政收入反映250多年间中国国内外贸易的概况。倪玉平教授的研究以税收的沿革为线索，贯穿整个清代（有时略做上溯），展示了如下几个方面：关税对于官方是何等重要，如何通过财政制度的整合实现税收的最大化，制度如何适应不断变化的现实环境，中国的税务官又是如何汇报工作的。全书还呈现了中国历史上一个关键时期的贸易状况。

该书用于讨论关税的一系列资料是从不同的档案馆搜集而来的。国家的边境、长江沿岸各港口、京杭大运河沿线，以及东海岸的港口均征收关税，有关的资料只有极少数能为不懂中文的学者所见。倪玉平教授将这批资料中已出版的部分与原件进行了核对。他结合文件形成的具体背景，对它们进行精细的整理，通过图表的形式呈现给读者，并据此进一步探讨导致关税收入波动的原因，以及时人（如皇帝、税务官）在他们的信件、报

告中对这个现象所做的解释。通过对相关数据、资料的评估，该书的结尾对清代中国贸易的发展历程做了审慎又具有批判性的解析，并对其做了总体性的评价。

该书的研究目标在于加深人们对于“大分流”这一亟待解决的历史问题的认识，亦即如何解释近代早期中国与欧洲经济发展出现的分叉。“大分流”如何发生，又缘何发生？当然，现有的研究已经给出了许多答案，但这个问题本身就有不同的维度，相关的讨论正在不同的层面、角度上持续进行。除了部分研究将地理位置等自然条件作为英国崛起、中国衰落的原因，大多数研究都将注意力集中于英国与欧洲大陆自身的转变上。这些研究认为，现代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制度的兴起、工业革命、欧洲城市的持续发展、政府构成的多样化、帝国的建立及其与殖民地的联系都促成了欧洲在文化上的例外主义。而同时期的中国通常被描述为一个具有惰性的社会——农耕经济占据主导地位，在国家内部形成了某种平衡，缺乏发展的动力和诱因。此外，中国政府也被认为是保守的。他们试图维持现状，避免任何形式的改变，并且偏好无为而治，不愿或无法提高税收和资本市场放贷。诚然，该书无法彻底解决税收和政府结构上的争论，但为这个议题注入了全新的要素，将讨论推上了全新的高度。

财政史是倪玉平教授在此议题上取得突破的主要领域。尽管税制并非本书的主要关注点，但他仍然将大量实践性的材料与制度性的材料相结合，更加深入地理解了经济发展、税收与政府结构的关系，以及其更为广泛的社会影响。就此议题，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曾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一般而言，内部争端——如对大地主的清算和对农村的强制征税——产生了欧洲国家重要的组织特征，如军事力量对文官系统的相对从属关系、对财政进行广泛监督的官僚集团……”^① 他的观察虽是基于欧洲社会，却为

^① Charles Tilly, War Making and State Making as Organized Crime. In Peter Evans, Dietrich Rueschemeyer, Theda Skocpol eds.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理解中国发展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框架，尤其是对理解中国的军事。在雍正朝，帝国向西推进，而晚清时期，面临太平天国运动和西方列强的侵略，这些都强烈依赖于对现有资源的利用。战争需要新的税收，这加强了帝国整顿现有税制的愿望，如土地税、盐税和关税。吊诡的是，鸦片战争这一不幸事件反而迫使中国对东海岸各港口的商业和财政机构进行重组。

该书认为，有清一代各关关税的变化反映了财政体系的大致发展过程。税收仿佛一个镜面，能够反映中国整体经济的发展状况（如各行业税收额的差异），但这个镜像十分复杂，有时甚至是模糊而破碎的。历史学家的任务正是阐明这个镜像是如何被扭曲的。该书通过对赋税收入及相关的文件进行系统、批判性地考察与组织来解决这个问题。这种批判性的阅读深化了不同来源的数据材料的整合，大量征税环节中的细微调整使得 18 世纪中期以降贸易税地位逐步提升的过程都变得清晰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清政府不仅建立起了一套新的税收管理体系，贸易本身也变得更为重要。在清代前期，帝国内部的商品交换是保障农耕社会的一种附加物。贸易不被视为赚钱的手段或是实现经济转变的工具，也不会超出个体商人经营的范畴。相反地，它被官方视作调和农耕社会缺陷的手段，尤其是当某个区域发生灾害时，能够从有盈余的地区进行资源转输。然而，一种新的形势在晚清时期（约 1840—1880 年）显现出来。贸易在真正意义上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同时带来了更大的社会影响。国家关税收入来源于贸易的税额翻了三番。这段时期内，由于受战争的影响，国内贸易出现了较大的波动，但总体仍然呈现缓慢上升的趋势。新的太阳自东方冉冉升起。起初，上海地区来自国际贸易的税额要高于其他地区，但这种现象很快便扩散至整个中国社会。普遍的税制改革随之而来。在西方国家的压力和援助下，清朝完成了从“国家财政”向“财政国家”的转变。

前言



2016年11月，拙著 *Customs Duties in the Qing Dynasty, ca. 1644—1911* 在 Brill 出版社出版。《清代关税：1644—1911 年》一书，即是以该书的翻译稿为基础写成的。

当初在写作 *Customs Duties in the Qing Dynasty, ca. 1644—1911* 的过程中，我努力直接以英文方式进行思维和表达，而非先写出中文稿，再将其翻译成英文。这就导致该书中有许多行文和表达都与中文的写作方式大相径庭。在决定翻译该书后，许存健先生高效地承担了这一工作，迅速将其翻译成中文。在此，向许存健先生表示诚挚的谢意。

在译稿的基础上，我又逐一对中文稿件进行格式调整和引文复原。需要指出的是，此前我已经出版《清朝嘉道关税研究》，对嘉道时期（1796—1850 年）的关税变化做了较为详尽的分析，所以在《清代关税：1644—1911 年》一书中，我对嘉道时期的分析尽量从简。

2005 年，我开始涉足清代关税史的研究。十余年来，得到诸多前辈和朋友的帮助。我不善言辞，很少向众多师友当面表达谢意，但其实一直铭记在心。特别是邓亦兵研究员将多年来在海外搜集的关税史料无偿送我查阅，深感无以为报。

本项研究时间跨度长，涉及面广，书中肯定存在诸多不足之处，恳请大家批评指正。

清代皇帝世系

顺治 1644—1661 年

康熙 1662—1722 年

雍正 1723—1735 年

乾隆 1736—1795 年

嘉庆 1796—1820 年

道光 1821—1850 年

咸丰 1851—1861 年

同治 1862—1874 年

光绪 1875—1908 年

宣统 1909—1911 年

目 录



序一

序二

前言

清代皇帝世系

导论 / 1

第一章 研究方法 / 5

（一）学术史回顾 / 5

（二）数据资料 / 6

第二章 清代关税制度 / 12

（一）传统中国的关税制度 / 12

（二）清代常关制度 / 15

（三）政策调整 / 17

（四）税率和附加税 / 26

（五）洋关 / 32

第三章 边疆边贸各关 / 36

- (一) 山海关 / 36
- (二) 张家口 / 40
- (三) 杀虎口 / 44
- (四) 归化城 / 46
- (五) 打箭炉 / 48
- (六) 凤凰城中江 / 50
- (七) 奉天牛马税 / 52
- (八) 梧厂、浔厂 / 52
- (九) 直隶潘桃口 / 54
- (十) 其他税关 / 56
- (十一) 本章小结 / 59

第四章 运河长江沿线各关 / 61

- (一) 崇文门 / 61
- (二) 左、右翼 / 64
- (三) 坐粮厅 / 70
- (四) 淮安关 / 72
- (五) 浒墅关 / 79
- (六) 扬州关 / 82
- (七) 芜湖关 / 85
- (八) 凤阳关 / 89
- (九) 龙江西新关 / 92
- (十) 九江关 / 96
- (十一) 赣关 / 99

- (十二) 北新关、南新关/ 102
- (十三) 临清关 / 107
- (十四) 太平关/ 113
- (十五) 武昌厂/ 115
- (十六) 荆州关、湖北新关/ 117
- (十七) 夔关、渝关/ 121
- (十八) 本章小结 / 124

第五章 沿海各关 / 126

- (一) 天津关/ 126
- (二) 天津海关/ 129
- (三) 江海关/ 131
- (四) 浙海关/ 135
- (五) 闽海关/ 139
- (六) 粤海关 (1861—1911 年) / 143
- (七) 东海关/ 145
- (八) 本章小结 / 145

第六章 洋关/ 148

- (一) 粤海关 (1865—1861 年) / 149
- (二) 江海洋关 (1844—1861 年) / 153
- (三) 浙海洋关 (1844—1861 年) / 154
- (四) 厦门、福州洋关 (1844—1861 年) / 154
- (五) 1861 年之后的洋关/ 155
- (六) 本章小结 / 160

第七章 关税和经济 / 163

（一）常关与洋关 / 163

（二）户关与工关 / 173

（三）人口增长和通货膨胀 / 186

第八章 结论 / 201

附录 / 205

附录 A-常关征税表：1723—1910 年 / 205

附录 B-粤海关税收数据表：1723—1860 年 / 242

附录 C-洋关征税表：1844—1910 年 / 243

参考文献 / 252

索引 / 255

后记 / 260